

接妈妈下班的孩子

■ 夏欣欣

周五晚上,在办公室做完手头几件比较急的事,抬头一看,还不到8点。与还在工作的同事打了个招呼,便向人民广场地铁站走去。本应先乘2号线,到娄山关路站换乘新开通的15号线。也许由于心里总想着2月1日下午的全市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会议,竟鬼使神差地上了1号线地铁。当到了原来常换乘的常熟路站时,才发现乘错了车。好在上海地铁四通八达,也只能将错就错,决定到上海南站再换乘15号线。

上了15号线地铁,居然有不少空位。因为后面有15站的路程,坐下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发现,坐在斜对面的一女子,脖子上戴着一条鲜红的围巾,左手拿着一本纸质书,正聚精会神地阅读,右手中的笔不时地在书上圈圈点点。近9点,丰翔路站到了,我出了车厢,向3号出口走去。这时身后不知谁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扭头一看,正是那位戴着红围巾的女子。她说:“宝贝,你又不和姥姥来接我了?”……“嗯,妈妈马上就出站了。”她柔和的声音,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在站内拐完最后一个弯,是约60米长的通道。没走多远,只见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穿着棉衣、戴着棉帽,逆着出站人流,兴奋地跑着。虽然出站的人不少,但孩子还是一眼就找到了身穿大衣、戴着口罩、戴着红围巾的妈妈,并将自己一头栽进妈妈的怀抱。

眼前这一幕,让我想起“二十四孝”中的“啮指痛心”。此典故源于春秋末期的一位名人——曾参,他是孔子的学生,也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侍奉母亲极其孝顺。一天曾参到山上砍柴,家里

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山上的曾参忽然觉得心疼,背起柴迅速返回家中,跪着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让你知道。”尽管目前还没有看到关于“母子间有心灵感应”的权威论证,但我对此深信不疑。即使眼前这位母亲不戴那条鲜红的围巾,孩子依然会迅速准确地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妈妈。

此时,坐在出口楼梯底端孩子的外婆,正笑眯眯地望着眼前这一幕。想必她想起了自己儿时接爸爸或妈妈的情景。

在出站的楼梯口,这位外婆坐的地方有一块长方形的厚纸板,空出的位置上放着两本儿童读物。不难推测,外婆和外孙在这里已经有一阵子了,而且他们经常在这里等候着自己的女儿和妈妈回家。不论等待的时间有多长,他们都不会寂寞,因为有书籍充填着时间,滋润着心田。

他们三人走出地铁站,年轻的妈妈打开自家自行车的锁,把车身一斜,儿子心领神会,嗖地一下就爬上了后座。刚走几十米,小男孩突然大声喊道:“妈妈你看,这么多自行车都被风吹倒了。”年轻的妈妈二话没说,车身一斜,孩子像又嗖地一下从车上窜了下来,去扶起倒在路旁的那一排自行车。“你力气小,妈妈来帮你。”姥姥也放下手中的书和纸板,一同干了起来……

站外,寒风瑟瑟。心中,温暖如春。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施一凡

追忆那个在江西农村的春节

■ 陈敬标

1970年4月,我报名去了江西波阳县谢家滩公社插队落户。

1970年10月,我们知青班被评上了上饶地区先进集体。我在知青班会议上提出:今年是我们来到江西插队的第一年,今年春节我们就不回上海,在这里过一个移风易俗的春节,知青班六人都没有意见。我把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公社知青安置办的周主任,周主任非常赞同我们的提议,让我写一份倡议书《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很快,公社和县广播站广播了我们的《倡议书》,波阳县革会毛主任还专门打来电话,支持我们的好倡议,让公社知青安置办的同志全力配合我们和贫下中农过一个有意义的、丰富多彩的、革命化春节。

我用了一周时间日夜奋战,编写出了《表演唱:老两口参观军民水电站》、《对口词:参军最光荣》《快板书:农业“八字方针”好》,再加上京剧《红灯记》《沙家浜》选段、独唱、小合唱等有了十多个节目。我充当了编

导、主演,演员是知青班6人、下放干部王部长的3个女儿、村民中选了2个会拉二胡、吹笛子的、6个有点表演特长的男、女青年。服装道具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做。

1971年的春节是1月27日。除夕下午进行了节目彩排,村里在仓库前的水泥场上拉上了几个大汽灯。老人坐在烘火的木桶上,小孩子兴奋得跑来跑去,妇女们指指点点,大家看着节目笑得前俯后仰。在表演《红灯记》第一场“接应交通员”时,我演李玉和,唱完“手提红灯四下看……等车就在这一班”后,表妹田美芸扮演的李铁梅挎竹篮上场,“李铁梅”叫了一声“爹”,台下观众看到生活中的妹妹叫哥哥“爹”,一下子就有人起哄、哈哈大笑,田美芸也捂着脸笑得双肩直抖。

我连忙对几个观众打了招呼,让他们不要捣乱。又开始彩排。

还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当知青陆文孝演的王连举开枪自伤手臂时,台侧配合音响敲纸炮的村民黄春旺忘了敲,幸亏拉二胡的村民黄国良急中生智用木板拍了一下桌子“啪”的一响蒙混了过去;后面演日本巡逻小队长的知青骆一民和演日本宪兵的村民黄金灿撞了一下,把粘在上唇的小八字胡碰得挂在了嘴边……场上乱了套,场下开了锅!

尽管彩排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们还是直叫好直鼓掌。几位特地赶来的公社大队干部也是乐呵呵的。

彩排结束后,大队知青安置办潘主任直夸我们,赣剧团下放的2位老师也鼓励我们说:“演得不错!”我对演员们说:“年初一到年初四,参加演出的所有人员白天晚上连轴转排练节目!保证在巡演时不出乱子!”

生产队黄炎寿书记加了一句:“只要演得好,参加演出的人员全部记双倍工分!”

大伙齐声欢呼。后来四天,大伙也真是拼了!一个个把自己的台词、动作练得滚瓜烂熟、相互配合得有条不紊,大队也派来党总支李副书记现场督战。

年初五一大早,轮到去演出的所在地的生产队队长就亲自来到沟下生产队接我们前往。县赣剧团的老师帮我们化好妆,大队党总支李副书记亲自带队。我们每到一个村口,村里就放起了欢迎的鞭炮。过了正月十五,本大队的16个生产队都演完了。演出期间,县报、县广播站得到消息都派来了记者现场采访并发了消息。

1971年,我们远离父母,在江西农村正月里为农民排演小戏,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



■ 金牛进宝,年年好

黄雨金

21、惊雷乍起(上)

对这些孔仲礼一无关注,事后真心祝贺,甚至对朱洪波说:“人的思想难抓,年轻人更活跃,你的担子很不轻啊!”语气平静得似乎什么瓜葛都不曾有过,他认为人的嫉妒心都有,只是多少而已,不必计较,宽以待人,以和为贵。特别是发出《公开信》许多天后,既没招致狂风暴雨,也没人找己谈话,仿佛石沉大海,音讯杳无。他做了种种猜测,最终他肯定了一点:申辩成功了,不然不会如此风平浪静。他加额自庆:大千世界自有公理在!他又庆幸当初采取了冷处理,因为彼此不伤和气。是啊,彼此为一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算得上三生有幸,何必兵戎相见呢?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他没等多久就把它当成插曲置之脑后,又全身心投

入工作,这下不光抓紧自己教的班级,还带领好整个高三备课组,袁婉倩协助得很得力,各班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缩小,结果接下来的高考取得了新突破:不是一枝独秀,而是万紫千红——又一次高考取得全年级大面积的好成绩。

孔仲礼又一次掀起了旋风,校内外一派赞扬声,校内教导主任尤其赞扬有加,连声称:“后起之秀!后生可爱!”然而锣鼓声中也有杂音。杂音一:全年级的好成绩怎么归功于一人?那置其他人于何地?这岂不是宣扬个人崇拜吗?杂音二:他的班考得好,他当然有份,但他只教了一年,谁都知道教语文是慢工活,无法急就章,显然前任教师打下了良好基础,突出他不就是抹杀他人,抬高自己打压他人吗?再说重点校的学生都是择优而取的,如果去教一般学校的学生能有这样的佳绩吗?杂音三:考试常有偶然性,有时考的与教的会巧合,这只能说运气好,上帝眷顾,岂能神化?……不一而足,遭受的非议比考得差还甚!其中多半出自朱洪波之口,他以语文教师内行来说事,以替一般水平的教师鸣不平的侠士身份说公道话,居然但又自然赢得不少赞同,形成不小的舆论。

朱洪波之所以“死磕”孔仲礼自有他的长远考虑:教导主任年事已高,学校面临考虑第三梯队问题,而教导主任抓教学,那么教学出色的孔仲礼很可能接班,而自己担任的政教主任怎么看也不像正规军,早想跳槽了,岂容他人抢占?为此他要抢占一步,把有力对手抵毁掉。

这回洋书记态度很公正,虽也不太相信如此成就仅孔的一人之力,但是对孔的功劳还是认可的,他认为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威力所结出的硕果,而孔自身也确

实很努力,并没有背上包袱,而且不是作秀,是真心实意的。

而教导主任却为此很苦恼。积累几十年的经验让他明白,在汪洋大海中,佼佼者易孤立,如果只对佼佼者表扬,则难免脱离群众,这又将不利于开展工作,甚至会被认为缺乏群众观念,不懂得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事还要依靠大家去做的,孤家寡人是大忌!可是又实在不忍心委屈精英,出色的成绩毕竟要靠他们创造,不能把他们当驴使!这也是每年评先进时最头疼的,工作出色该评的往往因“群众关系不好”而难产,而口碑较好的却又多半是“好好先生”,难负重任,最终为求太平而将就处之。评个先进,不过是发张纸罢了,竟搞得鸡犬不宁。评个先进尚且如此,何谈提干呢?

校长也有同感,但毕竟是一校之长,他另有一手……

正在热议中,忽然平地起风雷:为纠正近期偏重知识轻思想、只专不红、培养知识贵族的倾向,转而强化甘当普通劳动者的教育,要求地处市郊的重点校试行半农半读,即把教室宿舍搬到农村,半天上课,半天务农,不以升学率为评价标准,而以甘当劳动者觉悟的高低来衡量。

这在一向以培养高质量毕业生为己任的华亭一中无疑是扔了个重磅炸弹,全校上下全方位震动,当然反应却大不相同:赞同的、议论的、疑惑的甚至反对的不一而足。

赞同的自然首推洋书记。作为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的第一反应是无条件不打折扣地执行,而且也确实要强化政治思想教育,防止唯智育倾向,甚至连最适合进行试点的人选都已考虑再三了。

校园静悄悄

■ 吴钟麟